

■专题:人工智能与儿童生活世界

殖民化与消解:技术异化下的儿童生活世界

杨 雄,杨晓萍,张 骞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 要:在资本与技术合谋、技术实践活动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不统一以及科学技术盛行的致思路径下,使儿童生活世界走向了殖民化,由此“技术—儿童”关系也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技术回归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生活世界价值理性的呼唤。在现代信息时代下,本真的儿童生活世界应超越资本逻辑,走向技术正义;厘清“技术—儿童”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内在发展逻辑,正视主客体关系;用技术的艺术思维审美地观照儿童的生活实践。

关键词: 技术;生活世界;儿童生活世界;异化;殖民化

中图分类号: G610;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9)09—0007—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9.09.002

Colonization and Dissolution: The Children's Life World under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logy

YANG Xiong, YANG Xiao-ping, ZHANG Qi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main body scale and object scale of technology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the prevailing pa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ildren's life world has been colonized, and the "technology-child" relationship has also emerged as a kind of the state of alienation. Technology returning to the children's life world is the call for the rationality of children's life world. In the modern information age, the true children's life world should go beyond capital logic and move toward technical justice, clarify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technology-child" relationship, f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use the artistic thinking of technology to observe the children's life practice aesthetically.

Key words: technology; living world; children's life world; alienation; colonization

技术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儿童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开展着技术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诠释与丰富着自己的生活世界。然而随着技术理性的工具主义盛行,儿童被动地生活在技术的世界中,儿童的生活世界逐渐被技术所奴役,儿童的交往与生存空间日益脱离生活世界,这种异化之存在反过来制

约与控制儿童的生活世界,儿童由此成为了机器儿童、电子儿童、技术儿童的化身,成为了技术的符号,这就是儿童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实表征。为了让儿童的生活世界摆脱殖民化的窠臼,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儿童,服务于儿童生活的逻辑,因此,有必要对儿童生活世界殖民化背后演绎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

收稿日期: 2019—06—05; **修回日期:** 2019—06—24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809420);重庆市博士后科研特别资助项目(Xm2017162)

作者简介: 杨雄,男,湖北荆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杨晓萍,女,四川自贡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张骞,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儿童青少年发展与教育。

探讨,以走出儿童生活世界的困境。

一、儿童生活世界的概念内涵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虽不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首次提出,但是它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危机》中被胡塞尔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并且这一概念承载着胡塞尔对回归“纯粹的先验现象学”的终其一生的哲学旨趣,由此也开启了哲学家们对生活世界理论的探索。

胡塞尔考察了现代科学的起源,他认为自伽利略始近代科学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模式是纯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这种科学却忘记它的起源与根源,更忘记了它与生活世界、与人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家主要的思维方向是从生活现实出发去追踪某种理论潮流,这一潮流马上便将他们(生活现实或生活世界)留在了出发点上,只是在技术的形式中,因而在将自然科学对生活所作的任何一种运用中才回溯到他们。”^[1]自然主义科学把自然规律和价值规范等量齐观,不能正确面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这就是欧洲科学面临的危机。因此,为了解决近代科学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引发的价值危机和社会危机,胡塞尔提出了要将科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他呼吁:“人们难道不能改变原有的心态,对生活世界按其本来面貌加以考察,认识它的活动性、相对性,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课题。”^[2]₁₀₈₈₋₁₀₈₉

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意蕴何在?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在自然而然、平平淡淡过日子的态度中,我们成为与别的作用主体的开放领域相统一的、有着生动作用的主体。生活世界的一切客体都是由主体给予的,都是我们的拥有物……”^[1]自然而然的世界是一种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但是生活世界的经验不可能具有由必然的普遍的命题表达出来的客观性,它本身是一个不能再被还原的最后的“剩余”,是不可超越的前提,因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更是一种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它不仅超越了特殊的现有世界,更是面向无限可能的生活世界。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体世界存在于世界中,人的存在不能脱离于生存而抽象地去理解,因此,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本体存在的那个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在吸收前人的哲学思想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性地生活世界理论,他认为生活世界作为文化的公共领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文化、社会、个性,在三者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凸显了出来,

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哈贝马斯看到了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作用,他强调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它所控制和奴役。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才能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们对生活世界不断地进行改造,但始终摆脱不了先验性和非历史性的窠臼,他们试图解决,却无法超越。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们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理解,以免落入生活世界概念的先验性和非历史性的陷阱。而马克思则是从生活世界的客观性、实践性和价值性三个维度把生活世界看作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即人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世界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人类理想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这种理想的生活世界用“类生活”来概括。在马克思看来,类生活是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而人的类特性就是指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₅₇。这才是马克思生活世界的本质所在。

事实上,“生活世界”作为全部文化形式根基的内在文化精神和自觉呈现,表达了哲学关注人的自我理解 and 自我发展、追问人生意义,寻求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根基的新的人文精神^[4]。“生活世界”的哲学转向演绎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与内涵的发展逻辑,体现的是一个从无人世界走向人的世界、从客观走向主客体相统一的过程。儿童作为生活世界中一个特殊的主体,有着自身内在发展的逻辑。我们既要承认儿童是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产物,是成人世界对儿童的价值赋予,是客观存在的,又要充分知晓儿童是独特的个体(未完成性)、是发展的个体(成长次序)、是能动的个体(行为逻辑)、是完整的个体(意义世界)。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儿童的生活世界内在演绎的逻辑是否符合儿童发展的方向呢?是否遵循了儿童发展的规律呢?我们必须管窥儿童生活世界的秘密。

“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自我世界的原初构造,从而转向主体间的世界。”^[5]因此,儿童的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它是一切儿童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基础,是一种本真的存在。儿童依据内在的需求和本能,沉浸于无规则、无规律的外在时间表的自在世界中自由地游戏,从而获得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它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追求的是一种诗性的逻辑。它是一种理想的、趋于完美的先验世界,也是儿童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追求与向往。

其次,儿童的生活世界是主体间的世界。主体间性文化是儿童主体与生活世界中各种主体相互交往而衍生的一种不同于成人文化的独特文化,儿童生活世界亦是一种文化情境,在文化情境中儿童的主体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儿童是一种游戏性的、创造性的、体验性的、情感性的、发展性的存在。这种独有的儿童逻辑文化是由儿童的本质决定的,它赋予儿童生命与成长、自由与创造、体验与发展,贯穿儿童生活的全部。

儿童生活世界从自在的世界转向主体间的世界,不是从一种生命样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生命样态,而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它衍生出儿童生活应有的三重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在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6]123} 儿童作为一种自然物的存在,理应当回归自然生活,当儿童从纯粹的自然中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类存在物”,儿童也就从自然人向完整的人进行过渡。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儿童的社会空间往往与儿童的自然空间分离与对立,造成儿童文化空间异化,儿童的文化价值与行为规范因此而扭曲。所以,儿童的生活世界也是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相统一的世界。

二、儿童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本质追问

马克思将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等同起来,揭示的是一种人与技术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在殖民化的儿童生活世界中,“技术—儿童”关系呈现的是一种异化状态,儿童迷失在技术的世界中。因此,积极地反思儿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状况,剖析儿童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源和实质,以还原儿童生活世界的本真。

(一)资本逻辑与技术合谋

技术是资本逻辑下的产物,也是资本逻辑赖以进行权利规训的场域,在资本逻辑的权力规训的强制下,包括个体在内的整个社会都陷入这种权利操控的机制之中。儿童的生活世界正是在资本逻辑的权力规训的强制下,在技术资本化或者资本技术化的过程中(即资本逻辑与技术合谋)逐渐走向殖民化,儿童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儿童。这是由资本和技术内在的同一性(即趋利性)决定的。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商品和服务不断在增加,牺牲是日常的开支,是通向美好生活道

路上的‘不幸事故’,因此剥削是合情合理的。”^{[7]82} 这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资本逻辑与技术合谋的本质。在现在智能化时代,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加深了资本逻辑与技术合谋的原罪,使儿童生活世界陷入了深深的危机。

(二)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的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不统一

技术实践活动是儿童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是儿童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从本质上来看,技术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更是儿童的一种生活方式,它表征着儿童的生存状态,也蕴含着儿童生存发展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它彰显的是技术实践活动的内外价值的一体化,以及实践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的高度统一性。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生产。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所提出的任何物种的尺度即客体尺度,它必须满足主体(即内在固有的尺度)的需求。客体自身的规定性和规律不仅制约着主体自身,而且通过主体的需要、利益、目的和能力等形式被应用于客体,从而成为主体确定改造世界活动的范围、方向、方式和结果的准绳和尺度。主体尺度内在地体现着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统一^[8]。但现实却往往割裂了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忽略了实践主体的多元性(技术主体和活动实施主体),技术主体为实践内容服务,但是技术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等直接影响生产的实践内容,进而影响实施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二是实践主体对客体的把握不够,导致在实践活动中违背了教育规律,忽视了客体的需求。儿童生活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之下儿童主动建构的意义世界。唯物主义辩证法把实践的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统一起来,建构出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还儿童有意义的儿童生活世界。

(三)儿童技术实践活动的科学技术思维盛行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近代世界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人的一种特殊对象物,即交换价值、货币和资本。如果把人与物的关系比作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话,恰恰是在人的主体地位被凸显、人的主体性最为发达的近代,物却取得了对人的全面胜利,人沦落

为物的客体,也即是儿童主体地位的失坠。这种形态被马克思定义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独立性,它是技术异化的表现。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看,技术异化的本质在于人自身的劳动实践,技术本作为改造自然、服务于儿童的一种实践活动体系,却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僭越成为了控制儿童、支配儿童的一种物化手段,它凸显的是一种目的性价值取向,忽略了作为实践主体的儿童背后不在场的存在之意义。

工具理性是科学理性的异化,是科学技术思维在发挥作用。科学技术思维善用数学方法对在场的事物的某一特定方面做精确的量的分析,随之抽象掉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性质和属性。在儿童的技术实践活动中,科学技术思维具体表现为过分注重技术知识的获得,提倡的是一种唯功利主义目的。儿童的生活世界由此被技术所订造和促逼,为人任意摆置,由此引发儿童生活世界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这里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9]529}

三、走出儿童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价值理性被疯狂僭越,价值被还原为事实,这种追求功利为目的的技术理性给儿童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世界里的儿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技术与儿童生活世界的冲突解决的关键在于处理儿童生活的逻辑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博弈。只有让技术的发展服务于儿童,服从儿童生活世界的逻辑,才能走出儿童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

(一)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儿童生活世界的技术正义,促进技术实践活动的生命转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总公式表述为 $G-W-G'$,其中 $G'=G+\Delta G$ 。体现了资本不断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断追求增值扩张的本质。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寻求增值的逻辑,毫无疑问,资本的本性是求利的,而且追求利益最大化。^[10]“技术资本的产生,起因于生产和经营对技术的需求,形成于市场交易和新的经济活动。”^[11]正是在市场交易和新的经济活动中,技术生成了资本,足见,资本的逻辑与技术的本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趋利性,追求最大利益。在现代儿童生活世界中,技术为了转变为生产力,通过儿童产品作用于儿童,进而生成资本。但是从生产力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往往过分追求经

济利益,而牺牲儿童利益。这就是资本的逻辑。那么,如何超越资本逻辑,走向儿童生活世界的技术正义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作用于儿童的技术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人全面的、自由的发展,它是从技术实践活动出发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因此,马克思的技术实践观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观,也就是说技术实践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手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机器的更新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没有让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反而使人成为了技术的附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更不在于技术实践活动,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即资本的逻辑在发生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具理性的加强导致了价值理性的衰退,致使技术实践活动异化。技术实践活动的工具主义使儿童的交往及发展走向异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就再也没任何别的联系了。”^{[12]274-275}

技术实践活动的生命转向是儿童全面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技术生命化是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从儿童自身的生命需求出发,将更多的人文与情感渗入其中,激发儿童的生命意识,从而促进儿童的生命自觉。因此,技术生命化即是让技术赋予人性,让技术具有生命的普遍特征。在幼儿园,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幼儿园的技术实践活动是以技术为载体的游戏活动,然而传统的技术实践活动,教师过多地关注儿童工具性的发展,往往将技术媒体异化为灌的技术,重知识的获得,轻情感的体验。这种远离儿童真实生活,忽视儿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技术理性之上的功利主义活动观。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技术实践观,让技术实践根植于儿童生活,服从儿童生活逻辑,而不是资本逻辑,从而实现儿童生活世界的技术正义。

(二)厘清“技术—儿童”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内在发展逻辑,正视主客体关系

技术与儿童是儿童生活世界中的两个概念范畴,它们特有的运行逻辑形成了儿童的现代文化。儿童现代文化的产生与变迁取决于技术与儿童的内在逻辑,因此,有必要厘清技术—儿童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

技术主体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依循儿童生活

规律和身心发展特点,通过政策制度性途径、市场互利性途径、儿童互惠性途径建构技术产品或者实践活动,他们充分反映了儿童的意志、情感、思想等等。进而技术实践活动主体与对象性主体(客体)通过实践活动发生相互作用,这是“技术—儿童”关系最核心的逻辑链,这条逻辑链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利益节点,一个是技术利益,向儿童传递的是一种技术理念与思想,它并非技术知识的获得,而是一种情感的体验与经验的获得。二是道德利益,它反对的是唯功利主义的技术目的,注重儿童内在情感与品质的发展。三是交往利益,对象性主体交往主要有内部交往、外部交往两种形式,儿童在交往中逐渐形成其社会性和文化性,进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发展。“技术—儿童”关系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知,“技术—儿童”关系链不是一个单线的从A到B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元的、循环交杂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网络上的每一个点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发生着不可估摸的作用。理想的“技术—儿童”关系反映的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思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存在,它是开放的、合理化的、面向未来的、真正服务于儿童本身。但是主体的多元性和客体的独特性决定了技术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往往让儿童“乌托邦”生活世界成了“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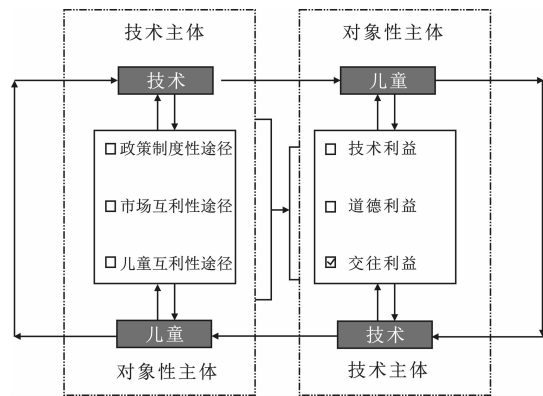


图1 “技术—儿童”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发展逻辑

技术是人类主观化的客体存在,技术产品往往反映了技术主体的意志、情感与价值观,是一种主观意愿,因此,当技术作用于儿童时,这种主观意愿就会强加于儿童本身,儿童要么成为技术的附属品,要么成为技术的受益者。因此,我们必须恢复与确立儿童在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让儿童真正成为技术的主人、生活的主人。马克思提出了“完整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6]345} 儿童正是在与技术合理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肉体与精神、理

性与非理性重新统一起来,儿童在生活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完整的人。

我们描述技术与儿童的关系,不仅仅在于揭示技术与儿童生活相互联系的本质,更在于要尽一切可能地揭示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儿童生活经验的各种关系,丰富儿童文化,进而促进儿童的身心和谐发展,这才是探讨“技术—儿童”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最终旨向。

(三)用技术的艺术思维审美地观照儿童的生活实践,回归儿童生活的意义世界

儿童的生活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内容、时空、过程等诸多方面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的系统^[13]。儿童的本质决定了儿童的生活是诗意的、灵性的、自由的与创造的。因此,回归儿童生活是儿童实践活动的价值旨向与终极取向。儿童的生活实践应然是真善美有机统一,真是儿童在活动中自由自觉地活动,儿童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善是儿童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活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美是在活动中获得愉悦、幸福与成功的体验。但是作为真善美的对立面,儿童的实践活动也存在着假丑恶的现象。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观照儿童的生活实践。

儿童的技术实践活动,如果技术的伦理意向性发挥作用,便是一种智慧的实践活动,是儿童用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与方式。这里的技术伦理意向性与技术的工具理性是相对的,技术的工具理性讲究的是一种科学技术思维,它只重视研究在场者,看到的是事物的类本质,却遗忘了支撑在场者的不在场——人和事物的无限存在的根基,即每个儿童生存的意义。因此,这种科学技术思维下的儿童生活世界也是被技术遮蔽的世界,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

伦理意向性则讲究的是一种艺术思维,它审美地观照在场事物的整体,而不对之做任何定量的分析。它注重对被给予的在场事物进行自由体验,而不试图对之作任何控制。更重要的是艺术思维在欣赏被呈现给我们的在场事物的时候,更加注重在场事物所生成的意境^[14]。具体在幼儿园教育场域之下,技术的伦理意向性,彰显的是一种游戏精神^[15],并且始终贯穿于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之中,引导儿童去感受蕴藏在生活中的深邃的经验和普遍的问题,使儿童在生活中通过思、言、行而实现人生的意义,从而确保幼儿当下的幸福生活^[16]。

(下转第21页)